

Source: 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联合早报

漫步) 严孟达

灵听凤山寺

凤山寺也，处闹市之中而不闻其喧嚣，置高台之上而不见其倨傲，驱车路经莫哈默苏丹路，不知情者，竟不知这座市中古庙之存在久矣。

其立身之地，酒肆林立，夜店一条街是也。我这两三年来数次造访该寺，总觉得它像是一位“大隐隐于市”的高人，既贴近尘俗，又超然自得；既与世无争，又常念人间疾苦。因它得了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卓越奖”，而对它多增几分景仰。景仰之心无以名状，直到上周末在大会堂听到新加坡华乐团的艺术演绎，才猛然醒悟对它无以名状之处，正好以音乐来表达。

由新加坡华乐团著名驻团作曲家罗伟伦所创作的交响音诗《凤山寺》，在“闽乡情韵”音乐会上作世界首演，成为充满闽南风味的音乐盛宴上的主题美食。

福建泉州南安人供奉广泽尊王，香火随着南安人在19世纪的大量移民而南来，在1836年于丹戎巴葛立凤山寺，1907年移至现址。乐曲一开始便通过和谐而多变化的音色，细致地描绘古色古香的寺庙建筑特色。舞台上大荧幕同步以细腻的镜头，呈现凤山寺的雕梁画栋，石刻碑文，当优美的华乐交响与炫丽的影像互相交融，令人逐渐陶醉其中时，一下子又被强烈的节奏感所震撼，叫人想象过去的大时代，南安祖辈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历程。曲子在高昂激荡，史诗般的壮丽声中结束，给音乐厅里留下时代巨响的回荡。

最令人回味的是，曲子在开头以乐器音色变化，衬托出的融和安详气氛中响起的“笃笃”木鱼声，给人以空灵，以及当乐声渐趋高亢中的“噌噌”晨钟，则予人以舒荡。长达10分钟曲子听罢的第一感觉是，曲子很“儒释道”，此不正是华族传统寺庙的精神所在乎？寺庙之于华族世代子孙，文化色彩似乎还重于宗教色彩。

歌颂新加坡早期南安人的移民奋斗与今日的成就，是曲子所要传达的主题，此即儒家的入世情怀。即使没有大荧幕制造的视觉效果，单是聆听曲子，也能让听者进入一种空灵的佛家境界。现实的凤山寺却在车马吵杂处，所谓“心远地自偏”，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道家情怀是也。“儒释道”精神的三结合，在这首曲子中得到了很好的艺术处理和提升。

曲因寺而作，寺也将因曲而广结善缘。

凤山寺和南音曲艺都身负世界文化遗产的荣誉，这次华乐团以闽乐为媒，把它们撮合在一起，是闽南文化的一次难得盛会。不仅是南音的表演形式有“中国音乐史活化石”之称（也被列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闽南语（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话）本身就是汉语的活化石。

韩国人的汉字读音听起来像福建话，其实，应该说朝鲜语提供了旁证，说明福建话（以及其他中国南方方言）与古汉语一脉相承。根据日台混血的

日本作家茂吕美耶在她的《汉字日本》一书中所说的，不仅人名地名，比起日语，朝鲜语的普通名词采用汉语读音的非常多。

源远流长的南音曲艺，我视之为古汉语的吟唱，这也是南音魅力之所在。此次，来自泉州市的南音女演员王一鸣唱唐朝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意盎然，韵味全出来了，“霜”（shiong）和“乡”（chiong）听来更有押韵的音乐美感。

南音独有的“压脚鼓”（艺人把左脚放在鼓上，时而轻压时而慢揉），两三年前我曾在湘灵音乐社的一场演出上开过眼界。这次，乐团指挥叶聪特地把来自泉州梨园戏的优秀压脚鼓师尤毓彬安排到台前，与华乐团演绎了《陈三五娘》中的一曲《荔镜圆》，以缓急轻重交错变化的击鼓节奏，歌颂爱情故事，诚曲艺中之奇葩。

高甲戏的滑稽演出，与来自台湾的歌手黄连煜拿着吉他，唱原乡味十足的闽南和客家时代曲，正反映出叶聪一向宜古宜今，中西交融的风格。

新加坡华族社会以闽南人为最多，但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已使得新一代闽南人对闽南文化有所隔阂，一场闽南风格的演出，仅能起一点提醒作用。然而，华乐团每一场风格各异的演出，不都是为国家的文化作长期的积累？

根据国家艺术理事会近日公布的2013年全国人口艺术调查，到表演场所观赏现场演出的人口比率，从2011年的48%下降到去年的40%。这意味着，推广与传承华族文化尤其是艰巨的文化工程，需要政府的给力，也需要民间的助力。

本文并非音乐评论，因本文作者不通五音，不识“宫商角（jue）徵(zhi)羽”，因此常羨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下岗”后专心学琴的本事。据他自己说“退而闲居”之余学弹琴，“受宫商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欧阳修因为有“幽忧之疾”（大概是现代人所说的忧郁症），以弹琴治病，也可见他的琴艺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也知道，有病的人不能只是弹琴不吃药，所以，当他为远赴偏远小地方当小官的好友杨寘（zhi）送别的时候，一方面鼓励他学弹琴，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必有得焉”，另一方面也担心这个体弱多病又心有不平的好友，到了那落后的小地方买不到药物。欧阳先生性情中人是也，他以美酒和弹琴为好友送别，还为此写了一篇好文章《送杨寘序》。

华人烧香拜神，所为何事？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已。一曲《凤山寺》，来自上海的作曲家罗伟伦的大意宏旨想必不在寺，也不在南安族群，而在国家社稷，南安精神代表的就是移民精神。文学家、音乐家借作品养其性托其志，自古而然。此曲足以奉献给独立50周年的新加坡。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